

[法] 露西·奥布拉克 著
顾良 张慧君 廖淑涵 译

飞出牢笼

里昂, 1943年5月

伦敦, 1944年2月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98—0303号

$\partial\beta\Pi X\Sigma \Xi\beta O_{\rho} \Xi\Pi$

$X\partial s \phi \Xi_{\rho} \alpha X_{\rho} \phi \vartheta \alpha P \Xi \vartheta s \vartheta' X \gamma_{\rho} \Sigma s s \Sigma$

$\Sigma P X \alpha X \phi \vartheta s P \beta s \Sigma \beta X \partial, 1984.$

$\Pi \Sigma \alpha \phi \beta \gamma_{\rho} \Xi \Upsilon \Sigma \phi \beta O \partial X \Sigma P \Xi \vartheta s \partial \Sigma \Pi \Xi P_{\rho} \Sigma P \beta$

$\phi_{\rho} \phi \Upsilon_{\rho} \Xi \epsilon \epsilon \Sigma T \beta \partial \Sigma X, O \Sigma \vartheta \Sigma T X I I X \Sigma P \beta s \phi \beta \alpha X \Sigma \vartheta$

$P \beta \epsilon X \vartheta X s \alpha \Sigma_{\rho} \Sigma T_{\rho} \Xi \vartheta \Xi X s P \Sigma s \Xi T T \Xi X_{\rho} \Sigma s$

$\Sigma \alpha_{\rho} \Xi \vartheta \Upsilon \Sigma_{\rho} \Sigma s.$

本书列入法国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出牢笼(法)奥布拉克(Émile Zola, 著);顾良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

Xs O ϑ 7—80109—231—7

I. 飞…

II. ①奥…②顾…

III. 奥布拉克(Émile Zola, 著) — 生平事迹

IV. $\Omega 835.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5245号

飞出牢笼

露西·奥布拉克 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618 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市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199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12.90元

怀念 埃莱娜和阿尔贝

以及受里昂盖世太保和民兵迫害的

其他牺牲者

—— 译者的话 ——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位法国抗德女英雄的亲身经历。作者露西·奥布拉克及其丈夫雷蒙·奥布拉克都还健在,现住巴黎13区格拉西埃街18号。作者用日记体裁记载了历时将近一年(1943年5月—1944年2月)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涯。我们在把这本小书翻译过来,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同时,愿意就该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谈谈我们的认识。

一、法国‘抵抗运动’的兴起

说到法国‘抵抗运动’的历史,人们往往误以为从1939年9月法国对德宣战开始。其实不然。“抵抗”这个词一直要等到马其诺防线被突破、英法联军全线溃退后才出现。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夏尔·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18日,

他在英国OOII电台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可能而且也绝不会熄灭。”^{〔1〕}人们往往还误以为，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演说立即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事实上，“抵抗”的口号最初只是旷野里的呼声，“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

在法国国内，军事失败使法兰西朝野上下惊慌失措，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抵抗运动”最初只是零星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公开亮出“抵抗”的大旗。法共领导在“保卫苏联”的口号下，支持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抵制戴高乐“用帮助英国反对德国的办法来杀害法国人”^{〔3〕}。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因逃避兵役而遭通缉，只身逃往苏联。社会党和激进党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推行“不干涉政策”而威信扫地，其党魁莱昂·勃鲁姆和爱德华·赫里欧等人因为对“法国战败”负有责任，被贝当政府送上法庭受审。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传统右翼，即使不是支持贝当，也大多持观望的态度。

最早的一次集体抗德行动出现于1940年11月11日：一群爱国大学生在凯旋门无名士兵墓前集中，沿香榭丽舍大街游行，抗议德国的军事占领。这一自发的和孤立的英勇壮举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其他的消极抵抗则无声无息，既没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也没造成对敌人的真正损害。三个重要日期标志着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使法共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展群众性的抵抗运动；1942年11月11日德军越过军事分界线，占领整个法国，使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抵抗力量有可能汇合成一股洪流；1943年2月16日维希政府颁布关于实施强迫劳役制

的法令,最终导致贝当的“对德合作”政策的彻底破产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全面高涨。

在这期间,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自由法兰西”逐渐站稳脚跟,但在外交上始终与丘吉尔冲突不断,罗斯福则对这个“自称的法兰西领袖”更是拒之千里之外。国内的抵抗组织陆续问世,规模很小,但数量众多。分裂、竞争和猜疑使这些五花八门的组织互存戒心,加上政治色彩各异、力量分散和众多内耗,国内抵抗运动在前进中举足维艰,除了东躲西藏,暗杀德军的恐怖行动还招来了疯狂的镇压。尤其是国外抵抗运动和国内抵抗运动的脱节给法兰西战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抵抗运动各派开始认识到团结的客观必要性。1943年5月27日宣告成立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则象征着抗德各政党、各派别在让·慕兰的努力下,最终实现了团结。

二、让·慕兰的历史功绩

让·慕兰(1899—1943)1940年6月任厄尔—卢瓦尔省省长,因拒绝与德国侵略军“合作”,被贝当政府罢免。1941年10月20日,让·慕兰经里斯本抵达伦敦。根据戴高乐的回忆,1941年12月,“我与让·慕兰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来伦敦前,他与抵抗运动的每一个派别都有过许多接触,并且探索过政治、经济、行政各界人士的意向。他对国内情况十分熟悉,我当即希望他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也提出了明确的建

议和具体的要求。”^[5]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以前,“自由法兰西”与国内的秘密联系被置于军事情报部门的控制之下,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英国人。无疑这是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所难以容忍的,其实际效果也远不能令人满意。

1942年1月2日,让·慕兰作为“戴高乐将军的特派员”回到法国,肩负以下三项重要任务:“争取国内抵抗运动各派别、各政党对‘自由法兰西’的拥护;协调各组织的抗德宣传和抗德行动;从非占领区的三大抵抗组织中抽调力量,建立准军事武装,直接受戴高乐将军的指挥”^[6]。这里所说的三大抵抗组织就是以昂里·福勒内为代表的“战斗”、达斯蒂埃·德·拉维日里领导的“南部解放”和以法共为主的“自由射手”。虽说各派都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良好愿望,但让·慕兰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遇到一个重大的障碍:各派不想放弃对所属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武装力量的各行其是又使“联合”和“团结”徒具空名。

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在此期间,让·慕兰多次往返于伦敦和法国之间,福勒内和达斯蒂埃也于1942年9月前往伦敦——上述三组织于1943年3月26日在巴黎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统一抵抗运动”协调委员会,任命与三派均无关系的德莱斯坦将军为“地下武装力量司令”。在此基础上,1943年5月27日,让·慕兰在巴黎杜弗尔街48号主持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最终实现了国内抵抗运动的统一。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即6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让·慕兰在里昂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狱中遭酷刑致死。

三、克劳斯·巴比案件

在里昂近郊卡吕尔区与让·慕兰一起被捕的难友中，唯独雷蒙·奥布拉克依靠其妻露西的营救，终于逃脱了盖世太保的魔掌。一家三口“飞出牢笼”，抵达伦敦。雷蒙得到戴高乐将军的重用，在配合盟军解放法国国土期间，出任马赛地区共和国特派员。露西则作为“南部解放”运动的代表，出席“临时协商议会”，是法国历史上最早的女议员之一。“劫车救夫”行动更在群众中广为传诵，使露西成为公认的抗德女英雄^[7]。

但是，1983年初，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被引渡到法国，在里昂地方法院对其杀害无辜平民的“反人道罪”提起公诉，这一案件引发了一场出人意外的风波。首先，已于1964年作为民族英雄入祭“贤哲祠”的让·慕兰受到了含沙射影的攻击。有人引用昂里·福勒内在《黑夜必将过去》（法国罗伯尔·拉丰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中的片言只语，声称让·慕兰力促成立“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对法共抢占要职和扩张势力大有好处，似乎这位民族英雄是“共产党的同谋者”^[8]。法国全国科研中心为此召开了一次由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和让·皮埃尔·阿泽马及众多历史见证人参加的圆桌会议^[9]。这次会议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尚存争议，但至少维护了让·慕兰的真实历史形象。

在里昂受审过程中，克劳斯·巴比最初以沉默相对抗，同时又通过其辩护律师在新闻界散布让·慕兰在狱中“自杀身

亡’及同案难友均已‘招供’的谎言，企图减轻罪责和转移公众视线。雷蒙·奥布拉克于1987年5月11日出庭作证，揭穿克劳斯·巴比玩弄的狡诈伎俩。法院终于认定克劳斯·巴比‘反人道罪’成立，宣布了处以‘终身监禁’的判决。这个盖世太保头目不但拒不认罪，反而倒打一耙，对奥布拉克夫妇进行疯狂的诬陷。

1990年7月4日，克劳斯·巴比忽然‘恢复了记忆’，通过律师要求面见法官，并向法院呈递了长达63页的供词。在这份所谓‘供词’中，巴比指控露西·奥布拉克系盖世太保的‘情报员’，硬说是露西用电话向他报告了卡吕尔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劫囚车’则是盖世太保为在抵抗运动中安插其情报员而导演的一出戏。这个离奇的消息一经传出，雷蒙·奥布拉克立即要求法院调阅里昂盖世太保有关弗朗索瓦·瓦莱（雷蒙被捕时使用的假名）一案的原始档案，并举行记者招待会，请抵抗运动的许多老战友出面证实自己的清白。与此同时，一些历史见证人发表了联合公告，声援雷蒙·奥布拉克的正义行动。公告指出：“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不再容忍抵抗战士的荣誉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蒙受攻击。我们将结成一个联合阵线，用法制赋予的各种手段，对背离事实和毫无根据的传闻进行反击。”^[10]

时至今日，针对奥布拉克夫妇的污蔑浪潮暂告平息，克劳斯·巴比已于1991年9月11日带着对抵抗运动的仇恨一命呜呼。但值得人们警惕的是，为法西斯招魂的‘翻案风’仍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此起彼伏。目前在法国进行的‘莫里斯·帕潘审判案’中，人们依旧能听到为贝当和维希政府鸣冤叫屈的言词。作者以见证人身份讲述这段充满斗争精神和自我牺

牲的历史,对今天的青年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正因为如此,本书出版后在法国的中学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

顺便指出,在露西·奥布拉克的笔下,我们见到的是众多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而不是脸谱式的“英雄”。抵抗运动的女战士不能脱离广大群众的保护,不能不管一家老小,不能不生养孩子……《飞出牢笼》这本纪实性小册子,经改编后,已由法国雷恩电影制片厂和法国电视一台合作拍成电影,据悉不久可望在我国公演。

注 释

- [1] 夏尔·戴高乐《回忆录》第1卷《号召(1940—1942)》,法国普隆出版社1954年版第330页。
- [2]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40页。
- [3] 张芝联等《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3页。
- [4]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1852年至今)》,法国拉鲁斯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
- [5] 夏尔·戴高乐《回忆录》第1卷《号召(1940—1942)》,法国普隆出版社1954年版第288页。
- [6] 让·慕兰的秘书达尼埃尔·科尔迪埃1983年6月9日在法国全国科研中心举办的“抵抗运动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见《让·慕兰和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法国全国科研中心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 [7]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研究员劳朗·杜左在“抵抗运动是男人的事吗?”一文中指出:“在抵抗运动中也出现了诸如露西·奥布拉克、达尼埃尔·加莎诺瓦这样出类拔萃的巾帼英雄。”见《法国现时史研究所学

报》第31期1995年10月。

- [8] 莫里斯·阿古龙《共和国(1932年至今)》第2卷,法国阿歇特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144页。
- [9] 这些见证人是:达尼埃尔·科尔迪埃(让·慕兰的秘书);克洛德·布尔代(“战斗”派领导人);克罗提乌斯·普梯(“自由射手”领导人);费尔南·格勒尼埃(法共代表);安德烈·马努埃尔(中央情报行动局代表);达尼埃尔·迈耶(社会主义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比诺(“北部解放”派领导人)。
- [10] 在公告上签名的抵抗运动老战友:克洛德·布尔代、塞尔吉·拉瓦奈尔、莫里斯·克里格尔、瓦尔里蒙;历史见证人:让·皮埃尔·莱维(“自由射手”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比诺、瓦扬·古久里夫人;还有政界要人:当时的社会党总理埃迪特·克莱松、前总理沙邦·戴尔马、米歇尔·德勃雷等。见雷蒙·奥布拉克:《抹不掉的记忆》,法国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页。

前 言

我出生在马贡的一个葡萄农家庭。父亲在一战期间曾负重伤,使我在少年时代就热爱和平。1931—1938年间,我在巴黎索邦大学念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的信仰共产主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接触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来自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国的同学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国内发生的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获得历史教师资格证书后,我在斯特拉斯堡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在莱茵河彼岸的德国,希特勒的煽动掀起了一片狂热,左翼分子和犹太人被集中起来,置于党卫军和刑事犯的看管之下,即人们所说的“集中营”。

1938—1939年,我结识了雷蒙·萨米埃尔。这位从事桥梁公路工程的年轻工程师当时正停薪留职,在斯特拉斯堡的工兵部队服役,任中尉。他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一年归来,而我恰好获得一份奖学金,准备第二年去美国撰写论文。他向我介绍美国的生活状况,显得十分殷勤。我们很快双双坠入爱河,并约定等我从美国回来后就结婚。战争于1939年9月3日爆发,我决定不出国了。1939年12月14日,我们举

行了婚礼。雷蒙·萨米埃尔是犹太人后裔，祖上于18世纪初从波兰迁到法国。法军大溃退后，他从战俘营逃出。过后不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为他谋得一个助教职位，而我还保留着奖学金的资格。1940年9月，我们申请赴美签证，但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怎能置家人、朋友和被占领的祖国于不顾？决定一经作出，我们的命运轨迹从此就确定了：创建和发展抵抗运动，在职业活动的掩护下，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我们添了一个孩子。我们好不容易维持着合法身份，直到1943年的春天。

当时，我们各有自己的双重身份，并竭尽全力使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如同几何学的平行线一样互不干扰。我们要保持居家过日子的门面。对我们来说，家庭是平衡和宽松的基本保障。在抵抗运动中，能有一对夫妇、一个家庭负责接待秘密的、孤独的过客，这十分难得。雷蒙和我表面上似乎一切全都公开：我们一家三口，外加一名女仆玛莉亚，从1941年秋天起就住在里昂埃斯基罗尔大街的一栋小别墅里。露西·萨米埃尔是一所女子中学的教师，学校位于埃德加·基内广场附近。作为桥梁公路建筑工程师，雷蒙·萨米埃尔当时为承接布龙机场跑道改造工程的谢曼公司工作。在受人尊敬的职业掩护下，我们同时过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1943年，雷蒙在抵抗运动中先后化名鲍尔蒙和奥布拉克，任“解放”组织地下武装负责人。遇上警察检查或被捕时，在他出具的身份证上，姓名栏中写着弗朗索瓦·瓦莱，住在红土岗丝织工人聚居区的一套小公寓里。几个月来，我们在那儿贮存了一些食品，尽管很想与伙伴们分享，但想到时世艰难，这些食品来之不易，必须留着渡过难关，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至于我，在抵抗组织中，我叫卡特琳娜。执行任务时，为防备警察盘查，我使用结婚前的身份证，以及在巴黎上学时的宿舍地址：巴黎拉多街，露西·贝纳尔小姐。

1943年2月颁布的关于实施强迫劳役制的法令使抵抗运动突然改变了活动重点。由于德军在俄国战场损失惨重，希特勒的参谋部不得不把国内工厂里能当兵的劳力全都动员参军，于是便想到利用被占领国的年轻人补充劳力不足。这项由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者共同颁布的法令，不但没有激起人们的热情响应，反而促使大批青年为逃避去德国从事强迫劳动而放弃工作和离家出走。

3月初，在埃斯基罗尔大街我们的住所开了一次会，商讨接待、组织和培训这批逃避劳役的青年的有关事宜。地下武装顿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兵源。雷蒙和莫兰、福莱斯蒂埃分别代表“解放”和“战斗”两组织，派人前往汝拉山区和萨瓦省，实地考察征集新兵的可能性。经决定将于3月15日再次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汇报。雷蒙已同他的助手拉瓦奈尔和瓦尔里蒙约定同一天在市府街7号六楼的一套公寓里会面，这套公寓是一对朋友夫妇借给他的。

在匆忙开展的调查期间，一名联络员在昂贝里厄火车站被捕，因为在别人向他提供的空白身份证上，他愚蠢地把出生日期和发证日期填写颠倒了。由于此人的招供，一些姓名和地址落到了法国警察的手里，于是导致了3月10日至15日的疯狂搜捕！20多名联络员和通信员、两位地下武装负责人及其助手相继被捕。

3月15日，雷蒙如期赴约，正中敌人的埋伏。瓦尔里蒙先他一步落网就擒。不一会儿，塞尔吉·拉瓦奈尔也到了。他

刚按门铃，一名警察应声而出，用枪抵着他：“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塞尔吉·拉瓦奈尔佯装服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折叠式橡皮棒，猛击身后的家伙，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梯，途中撞着正往楼上走的另一名警察。两人扭打作一团，摔倒在地上。正当塞尔吉渐占上风时，又赶来两名警察增援。这一下，他就活该挨揍了！

拉瓦奈尔逃跑未能成功。在搜查他的秘密住所时，雷蒙曾试图逃跑，也未成功，瓦尔里蒙最后逃跑，但同样失败。一天清晨，瓦尔里蒙利用看守不备，从警署溜了出来；看守并未睡熟，随即在后紧追不舍。他向前飞奔，拐进一条小街，谁知竟是一条死胡同！……

根据常规，被捕人犯先由警署转送到看守所，经预审法官审问后，再关进监狱。

6月，由于叛徒出卖，盖世太保成功地实施了两次大逮捕，给抵抗运动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巴黎，逮捕了地下武装力量参谋长德莱斯坦将军；在里昂，1943年6月21日，纳粹警察头目巴比逮捕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主席、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让·慕兰。逮捕只是晚了一步，未能对抵抗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害。让·慕兰死于敌人的酷刑之下，但事业后继有人。惨剧发生期间，活动条件十分艰苦，但地下斗争从未间断，随着维希警察和盖世太保的扩充编制，镇压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

在抵抗运动中，我有自己的位置。我深爱着我的丈夫。雷蒙于3月15日被关进法国监狱，在我的积极营救下，终于在5月获释。后来，他在卡吕尔又与让·慕兰一起被捕，全靠

我和突击队同志们的机智勇敢，再次把他从盖世太保的绞刑架下解救出来，当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在那样的斗争环境中，我不可能天天记日记。我只想以日记的形式，讲述我1943年5月到1944年2月那9个月里，作为一名抵抗战士、一个妻子、一位母亲的生活和经历。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在时间和事件的叙述上，我力求做到确凿无误。在写作过程中，我的丈夫和我们当年的一些战友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

1943年11月及1944年1—2月，英国OOII广播电台从伦敦向法国抵抗运动发送了许多秘密信号，其中一些信号与奥布拉克一家有关。

由于气象原因，英国飞机曾两次未能在约定地点着陆。

1944年2月8日，OOII电台第三次发出同样的信号：“飞出牢笼”，就在这个月明之夜，英国飞机终于如约前来，把我们接走。

1944年2月12日

醒来时，眼前一片迷惘。空气中弥漫着医院特有的气味，耳旁传来阵阵窃窃私语……我抬起头来，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但见用铁环套在床头的摇篮，里面睡着一个婴儿，小脑袋耷拉着。噢，我们的女儿……

“请您躺好。您的女儿是最重的新生儿，生下来就有10磅。”我机械地听着护士所说的话，她的法语讲得像学生一般正规。我服从了她的要求，脑子也逐渐不那么迷迷糊糊了。我只听得同屋其他病友叽里咕噜的闲谈声，却一句也听不明白。我身处伦敦。今天是1944年2月12日。我叫露西·奥布拉克，今年31岁。

护士把婴儿放在我的床上，掀开裹着她的白色羊毛大披巾。光身子的小家伙笨拙地舒展着四肢，细细的金色胎发贴着头皮，脸上的皮肤皱成一团。

“不要吓着孩子，”护士又把婴儿放回摇篮，“您明天再给她喂奶吧。”

我身心俱乏。被单盖住了全身，只露出一张脸，我低声哭泣着。泪水浸湿了枕头。我努力拼凑失落的记忆，使自己完全恢复清醒。伦敦，1944年2月，10磅，卡特琳娜的体重将近4公斤！

我想起昨天晚饭时伦敦的空袭。就像英国人选择月明之夜进行空投一样，德国人喜欢选这个时候发动空袭。当时我